

馬來西亞華人



第二卷

何啟良 主編



# 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 内篇

---



# 何乃健

Ho Nai Kin

*He Naijian*

(1946-2014)

作家、水稻专家

## 水稻专家兼田园诗人

何乃健是诗人、散文家，与田思、潘雨桐并列为马华生态书写的三杰。他的作品亲近自然、倡导环保、情理交融、文词优美、富有禅意、独具一格。香港著名诗评家兼编者何海把何乃健喻为“我们的诗丛之宝”。新加坡作家周灿赞美其作品像“包了杏仁的朱古力”，“当甜甜的巧克力溶化之后，继之而来是杏仁的香”。他获奖甚多，其中包括 1978 年的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及潮州八邑会馆统一学术文艺出版奖的诗歌奖，1982 年的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主办的第四届文学奖的散文奖，1985 年的第七届文学奖的翻译奖。何乃健除了在马华文坛贡献良多之外，也是国际知名的水稻专家。他曾在国内外的研讨会上以英文、马来文发表了百余篇农业论文，且多篇论文被选入国际水稻研究所 (IRRI)、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英联邦农业署 (CAB International) 与日本国际农业科学研究中心 (JIRCAS) 的论文集。

何乃健，祖籍广东顺德，1946年生于泰国曼谷，1953年移居槟城。他考获马来西亚大学农学士，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生物学硕士。曾任职于吉打州慕达农业发展(MADA)，并负责全国最大的稻产区里有关水稻双造种植的农艺技术推广及训练工作。曾任该机构稻作学顾问。

何乃健自小学时期便开始写作。他曾将习作寄给香港的《儿童世界》和《世界少年》，虽然没获得编辑的青睐，但他不因此而气馁，而是更奋发学习与写作。五年级时，他的作文经常被老师挑选投到光华日报的《学生文艺》。五角钱的微薄稿费对当时家道中落的何乃健来说是一大鼓励，从此踏上文学的道路而无怨无悔。对于创作，他总是抱持着坚持与严谨的态度，除了对文字的应用要求节约精简，在形式、体裁与内容上，他认为“与其栽种外形硕大，切开却淡而无味的西瓜，倒不如培植晶莹甜美的无核葡萄。”

何氏毕业于国内大学的农科，他虽长期接触英、马来文，但他对中华文化依然没有忘怀。他的孺慕之情也深切地表达在其作品中，因此其作品中处处可见他对中华文化关爱、热衷、向往、呵护的思维体现与表达。在追求中华文化的同时，他也重视去芜存菁，吸收优质的重要性，批判与淘汰中华文化落后腐朽的一面。他也经常以稻为散文的题材、作诗，也经常以稻顽强的生命力以及广泛的适应能力来喻作自己身为华族的自豪，坚持刚毅地为传承中华文化献出最大的努力，他在《稻花香里说丰年》的后记中说：“如果有来世，我愿意做一株平凡的稻草，如果能再活一次，我仍然会坚持，中华文化的沃壤中把根扎牢。”

何乃健的诗是公认的好。诗评家陶融先生把何乃健的诗才誉为一颗颗亮晶晶的星子；香港1960年代综合性刊物《海光月刊》的诗丛主持人何海把何乃健喻为“我们的诗丛之宝”。何海也是何乃健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贵人，是他启发了何乃健对写诗的兴趣，何乃健在《我的文学情怀》里这样说道：“我深深感激已故诗人何达（陶融、何海）先生，当年在香港的《海光月刊》、《世界少年》，以及《伴侣月刊》的诗评中，给予年少的我挚诚的启导与激励。是他教导我运用形象思维来抒情写景。是他鼓励我勇敢地以自己独创的语言来捕捉自然界的千姿百态。是他训练我的想象振翅高飞，凭借心

灵的眼睛和耳朵，去感受生命的脉动。是他劝服我以谦卑的心克制浮躁努力学习诗艺，认真的写了千余首小诗之后，再经过多次修改，才敢以其中的五分之一拿去发表。”

对于诗歌的格式，何乃健曾言自己比较偏写小诗，因为小诗的写作如摄影，一闪的意念，一瞬的美景，一纹的感触掠过心头时，三言两语往往比长篇大论更能将一切的投影在心灵攝住；而他的诗最强的特色，便是对大自然细腻真切的描绘。何乃健是国际知名的水稻专家，从青年时代就在吉打的农村帮助稻农从事改良水稻的工作。已故诗人游川曾戏称他“吉打每一头水牛都认识的诗人”。由于长期在乡野田间工作，何乃健对大自然有着深挚的热爱。他独特的文字魅力、奔放的思想 and 宽阔的胸襟，以及对大自然的热爱，都投注在诗歌的字行间，洋溢着亲切、温暖，以及对生活的热爱。难怪秦林赞说何乃健的诗风格清新，文字纯净。何乃健中年以后较少写诗，偶有所作，篇幅都比小诗来得长，充满对民族文化的执著与关心社会的忧患意识，如〈掌纹〉、〈粘土〉、〈端午〉、〈灯笼〉、〈撒哈拉沙漠〉、〈霾害〉等，虽没有小诗的精简风格，但诗行间却流露着浓郁的真情实感。

除了诗歌，何乃健的散文也富有情感，也对土地和自然界发出无限的赞叹，也对环保有着强烈的意识，这和何乃健的居住环境和从事的工作有莫大的关系。他自小生活在湄南河三角洲，与绿意盎然的稻禾和一望无际的黄金稻穗朝夕相处，对这鱼米之乡有着无法割舍的强烈情感。初中时的他已开始为育养大地的大自然，为此刻摄人的一情一景一物，写下一章章、一页页以水稻为题的乐章。大学毕业后，他毅然走入了双季稻种植的慕达灌溉区里，在那儿度过了数十年的绿色岁月。他终日与蓝天为伴，与绿地为友，为这片喂养万物的大地付出全部的青春，他无怨无悔。他说：“以我平凡的作物，不只是一辈子的时间不够用，即使用上几辈子的时间来学习，恐怕还探索不完一粒壳里的深蕴奥秘。”他还经常以稻草自许，虽然平凡而卑微，但始终对人类默默奉献。关于自己作散文的态度，何乃健言“不可以言不及义”，在过去数十年不断的学习、思考与创作的过程中，他尝试以生命去努力将酝酿与跳跃心灵深处的激情、感受与思维坦率地流露出来。何乃健严谨又不失诗味的写作态度，

难怪新加坡作家周灿赞美其作像“包了杏仁的朱古力”，而且阅赏何乃健之作就像是“当甜甜的巧克力溶化之后，继之而来是杏仁的香”，语言细致优美、内容丰富且富有韵味。田思也赞何乃健是马华文坛上最善于经营美文创作与讲究积极修辞的一位散文家，其作情文并茂，文理交融。

何乃健作品中的优点不仅于此，对人性的尊严与丑恶，生命的局限与无常，国家与个人，也是他创作的焦点和素材。他对人本思想的深度和人生哲理有自己的一套阐释，对他而言，生命是无限珍贵，无论贵贱，都值得大家去尊重和重视。他的人生观的形成和他挥不去的童年阴影有着很大的关系。泰国的曼哈顿政变事件发生时，激烈的武装冲突和战火纷飞，让泰国人民顿时陷入了水深火热、担惊受怕的险境当中，而当时五岁的何乃健不幸被弹片击中，在留院期间目睹了许多无辜者的伤痛悲怆、痛不欲生的画面。与死神擦身而过的惊险经历，使他对生命的无常有深刻的体悟，他誓言要把热爱和平的信念形成他往后整个思想和人生观的支架，并透过作品，将和平信念传达开来，并终其一生都抱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宣扬惜福惜缘，穷一生的精力，孜孜不倦地推广佛教，也将佛禅的哲理融入了作品里头，以禅的智慧来提升个人生命的价值：“只要净化成一朵云，还是可以变成虹的。”

何乃健的诗文文质并重，以独特的风格与题材自成一家，在推广环保、佛理、珍爱生命方面不遗余力。与何乃健交情甚笃的田思曾这样评价何乃健，他说：“从乃健身上，我们看到文学、科学与宗教的美妙结合，也看到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如何将职业与志业调协得如此和谐，如此惠益人心，流泽广泛。”

杨林宜

#### 参考资料

- 何乃健：《稻花香里说丰年》，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4。
- 何乃健：《逆风的向阳花》，吉隆坡：雨林出版社，1997。
- 田思：〈化稻谷魂魄为文字的精灵〉，载《星座》文艺副刊，2010年2月28日。



## 洪楚庭

Ang Cho Teng

*Hong Chuting*

(1935- )

政治人物

### 北加人民军总司令

洪楚庭是六七十年代砂拉越共产主义武装运动的主要领导之一。从1968年开始，他是“砂拉越解放同盟”（砂盟）第三省省委会的核心领导。1969年受委为砂盟中央东部第二分局的第三书记。1973年斯里阿曼谅解备忘录签订后，为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中央东部第二分局的正书记。从1968年9月22日至1973年10月20日的五年间，他担任北加人民军总部的副主任，也是印尼马罗河基地支队的指导员。1973年年底，北加人民军主任兼政委黄纪作领导与砂拉越耶谷政府谈判，然洪楚庭和王连贵领导的两百多人坚持武装斗争。从1973年至1990年，与政府签署和平协议的17年间，洪楚庭是北加人民军总司令部的总司令兼政委，统领三个游击队支队及东北突击队。



洪楚庭，又名学群，1935年出生于广东潮安县。他是父亲洪永坤，母亲郑炎娇的独子。其父战前来到砂拉越三马拉汉河(Samarahan)从事跑船买卖。10岁时，洪氏随母亲从中国南来与父亲一起生活，并在古晋第四小学接受教育。

1951年左右，一批左倾青年在古晋的华文中学活动，鼓吹反殖的思想，争取砂拉越的自治独立。洪氏于1954年进入古晋中华中学读初一，在校期间，他受左翼思潮影响，与校内的左倾青年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同年，他加入由文铭权、王馥英、黄纪作、林永伦等人领导的“砂拉越解放同盟”(砂盟)。砂盟于1953年7月由来自古晋的刘荣任策划成立，目的是从英国人手中争取砂拉越的独立，最终建立以共产主义为主导思想的砂拉越。

砂盟是10.29学潮的产物，1951年古晋中华中学爆发10.29学潮，校内左倾学生反对具有国民党背景的新聘教员涂耐冰，后来英殖民政府介入处理后，风暴方停止。1955年，学生承继前次的经验再发动3.30学潮，反对初中二教导几何课的蔡永祺老师，右倾的黄中廛校长为此事下台平息学潮。洪氏参加了3.30的罢课。在学潮中，他与其他左翼青年一起成长，想要参加实际的革命斗争。

1957年11月，洪氏被领导选派去诗巫进行第三省的地下活动。同年12月，他被委为砂盟第三省省委会组长。1958年，入读诗巫中华中学高二，在学校里培养干部，1959年他高中毕业后，在板厂里当了两年的技工，但他实际的身份是砂盟的秘密地下分子，在板厂从事工运。1961年6月，他被委为第三省省委会的委员。1962年6月22日，英殖民政府开始逮捕反英的领袖和地下分子。12月8日汶莱发生政变后，英殖民政府加强镇压，借机逮捕左派人士，洪氏逃到森林，隐藏身份，化为割胶工人。1963年，洪氏与同学王祚英结婚，他们有着推动砂拉越自治独立，建立共产社会的共同理想。

1963年，砂拉越加入马来西亚联合邦，砂盟被迫准备武装斗争，1964年5月中旬，文铭权、黄纪作、杨柱中、黄纪晓等人从印尼接受军训回到砂拉越与印尼边界，成立砂盟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武装部队——砂拉越人民游击队。1965年，砂盟决定筹备建党，但

因躲避英殖民的逮捕，文铭权等人逃回中国，计划因此暂停。1966年，洪氏左派的身份终于曝光，为了躲避政府军的追捕，他转入地下。左倾的武装力量也逐步在砂拉越展开武装斗争。1968年开始，洪氏擢升为砂盟第三省省委会的核心领导。1969年4月，他受委为砂盟中央东部第二分局的第三书记。1971年9月19日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宣布成立。1973年斯里阿曼谅解备忘录签订后，洪氏升任党中央东部第二分局的正书记。

从1968年9月22日至1973年10月20日的五年间，洪氏担任北加人民军总部的副主任，也是印度尼西亚马罗河基地支队的指导员。1973年年底，北加人民军主任兼政委黄纪作领导的第二省边区武装斗争主动与耶谷政府谈判，签订斯里阿曼谅解备忘录。那次的签订，对北加武装斗争的打击非常大，并且引发许多重要领导出走效应。整个边区的斗争急转直下，只有洪楚庭和王连贵领导的两百多人坚持留下来。

当砂盟的第一代领导文铭权于1960年代初被逐，1970年代黄纪作投诚后，洪氏是北加共产党及北加人民军的实权领袖。从1973年至1990年与政府签署和平协议的17年间，洪氏是北加人民军总司令部的总司令兼政委，统领三个游击队支队及东北突击队。

1989年12月2日，马来西亚政府、泰国政府与马来亚共产党（马共）三方签署《合艾和平协议》，马来亚人民军解散，马共成员重返社会。翌年，政府也向北共提出进行和平谈判，于7月26日至27日展开。其实，1980年代中期，洪氏观察国际情势，审时度势后，早已认识到武装斗争不再有任何作为，但本着对共产主义信念的坚持，抱着不胜利也宁愿牺牲，即使坐牢也不投降的决心，与其他武装分子继续滞留在森林。

洪氏滞留森林期间，始终没有放弃研究马列主义，他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研究政治问题。他年少时顺应着时代的潮流投入革命的狂澜里，数十年如一日，1973年武装斗争受挫后，依然相信保存实力，等待时机。即便这样的时机始终没有到来，在1990年与政府签署《和平协议》时，要求政府不使用“投降”、“投诚”、“恐怖分子”的字眼，为武装斗争保留最后的尊严。根据协议，北加共产

党由即日起解散、所有部队成员走出森林、宣布效忠最高元首与国家，遵守国家宪法与法律；政府则对砂共武装部队过去所作所为既往不究，并将公平对待这些共产武装人员。洪氏始终认为他所领导的北共武装反殖斗争是正确的，而且贯彻始终，坚持理想。他回忆说：“现在回头看当时的社会，战争的时代已经终结，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所以武装斗争已经不适当了。其实是政府主动谈判，不是我们先开始。”

1973年洪氏的夫人在斗争中丧生，后续娶同是武装革命分子的卢宝兰。重返社会后，两人定居民都鲁 (Bintulu)，生产红砖。但与昔日战友的联系始终没有中断，1998年砂拉越中区友谊协会成立后，洪氏一直担任顾问。

黄妃

#### 参考资料

- 笔者与洪楚庭的访谈。时间：1998年11月23日、2010年9月10日。
- 洪楚庭：〈对砂拉越反殖斗争的回顾〉，《犀乡资讯网》。
- 老朋友：〈北加里曼丹的革命武装斗争〉，《犀乡资讯网》。
- 老朋友：〈北加里曼丹革命史片段——砂解盟前前后后〉，《犀乡资讯网》。
- 林煜堂：《江河浪淘沙——砂拉越大时代儿女情怀》，自行出版，2009。



## 宏船

Hong Choon

*Hong Chuan*

(1907-1990)

僧人

### 促进中新建交的新加坡佛教领袖

宏船法师，新加坡佛教界的一代领袖，在佛教建设、社会福利、宗教和谐、慈善教育、国际交往等各项事业中都曾不遗余力。其历任多个宗教团体职务，主要包括：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1964-1986）、新加坡佛教施诊所创办人兼主席（1969-1986）、新加坡佛教僧伽联合会主席（1966-1990）、新加坡宗教联谊会发起人（1949）兼轮任主席（1974-1975）、光明山普觉禅寺住持（1947-1990）等。宏船法师亦是一位非官方的宗教外交大使，在中新未正式建交前，促进了两国佛教团体的交流。

宏船，俗名朱成基，生于1907年农历九月初三，原籍福建省晋江市霞福村，幼时曾入私塾。其十岁丧母，深感人生多苦，事态无常。年仅13岁时，宏船便常到庆莲寺诵读《楞严咒》。某日在观看了傀儡剧《目莲救母》后，其更是深受感动，遂有出家修道之志。1922年，15岁的宏船听闻会泉法师（1874-1943）主持泉州承天寺，常开堂讲经说法，道誉深隆，便至承天寺依会泉出家，并得赐法名宏船。翌年，其赴莆田广化寺，依本如老和尚为戒师，受三坛具足大戒。

1924年，厦门南普陀寺住持转逢和尚（1879-1952）提议将南普陀寺从子孙庙改为选贤制的十方丛林，并选会泉担任第一任住持。宏船亦随会泉移至南普陀寺，于师父身边为侍者。与会泉的朝夕相处使宏船尽得师父之口传心授。1927年，会泉三年任满告退，由太虚大师（1890-1947）接任住持。宏船因此获得了向太虚大师求教的机会，得大师启示佛学枢要，为以后的弘法事业奠下深厚基础。1933年，会泉于万石莲寺开设佛学研究社，以指导僧众从事宗教研究。此时的宏船已从侍者升任监院，接管寺务，使会泉师父能专心讲学，培植僧材。太虚曾到万石莲寺访会泉，并书一联以赠宏船，句云：“海上有山森万石，人间度世仗宏船”。太虚对宏船的器重可见一斑。

随着中日战争的爆发，宏船法师随师父于1938年南渡，先后游化了仰光、印尼、槟城各地。1940年，其又随会泉回到新加坡，驻锡光明山普觉禅寺，与创建普觉寺的转道和尚在寺院共建大悲法会，祈祷世界和平。转道因普觉寺传继无人的问题与会泉商议，欲传法于宏船。宏船念恩师会泉嗣法于雪峰寺喜宗上人，是佛化老人的法孙。而转道亦受学于佛化老人，早有法系因缘，故接受转道之嗣法。1941年，会泉于马来西亚槟城成立妙香林，并于1943年由宏船继任妙香林住持。宏船上任后，从新加坡礼请广余（1920-2006）出任监院，二人合力完成了妙香林的增建工程。同年，转道和尚于日军占领新加坡期间圆寂于普觉寺。二战结束后，宏船受新加坡普觉寺、普陀寺、龙山寺、居士林与中华佛教会联名力邀，南下住持光明山普觉寺。1947年，其从槟城返新加坡，出任普觉寺第五任住持。

宏船初进山时，光明山普觉禅寺面积达 30 英亩，但由于地点偏僻，广阔之余更显荒凉。除一座大殿及前庭一僧舍小殿外，寺院周围蔓草丛生，坟冢累累，橡林深深，行人罕至。宏船法师接任住持后，农禅并重，开荒田地，种植花生、番薯以自给自足。生活虽然十分艰困，但宏船刻苦耐劳，广宣法化，普结善缘，发起大悲法会，为民回向植福。同时，其每年赴普陀寺、居士林等处，巡回开坛讲经，先后宣讲了《大乘起信论》、《金刚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心经》、《阿弥陀经》、《地藏经》等，更组织诵经班，以培植教化。宏船修学精进、弘法热情，因而声誉与时俱进。每逢法会开示，闻法弟子人山人海。光明山之名也因此遍布新加坡，远播东南亚各地。以是善缘，宏船历年来深得善信的鼎力支持，扩建普觉寺，先后兴建了大悲殿、钟鼓楼、甘露戒堂、藏经楼、方丈楼、客座禅楼、修身院，并美化寺院的周边环境，恢宏建设。经多年努力，宏船成功地把普觉寺从偏僻荒凉的小寺院发展为新加坡最大的名胜巨刹，为当地的佛教发展作出了贡献。

1949 年，新加坡佛教大护法李俊承（1888-1966）发起成立新加坡佛教总会。翌年，佛教总会注册成立，李俊承当选为主席，宏船当选副主席。佛总委员及主席每两年改选一次，以后多届均由李俊承与宏船连任。1964 年，李俊承以年事已高为由，不再续任，宏船在众望所归下当选佛总主席。其任主席期间，积极推动会务，如改建由佛教总会所办的菩提学校为五层大楼，并为佛总购置位于蒙巴登路 (Mountbatten Road) 的新会所。1969 年，宏船在常凯（1916-1990）的建议下，创办了新加坡佛教施诊所，以缓解贫病大众的痛苦，受惠贫民不计其数。

新加坡是个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国家。由于宗教信仰不同，习俗各异，各宗教互动之际，摩擦在所难免。基于新加坡的特殊国情，宏船与各宗教领袖举行座谈，联合发起新加坡宗教联谊会 (Inter-Religious Organization)。1949 年 3 月，该联谊会正式成立，借维多利亚纪念堂召开成立大会，吸引两千多人参加。宏船法师积极参与宗教联谊会活动，并曾担任宗教联谊会轮任主席，为宗教和谐尽了一份心力。

1980 年初，宏船年届耄耋，先后辞去所兼各职。然而，一旦有

任何团体需要帮助，老法师都尽力协助。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法师屡获中国佛教协会邀请，率领弟子八次访华，会见高层政治及宗教领袖，巡礼四大名山，并重修祖庭泉州承天寺及诸名刹圣地。1988年9月，宏船邀请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兼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1907-2000）率团访新。在中新于1990年正式建交前，法师多次走访中国，大力促进了两国宗教之间的友好关系，影响深远。

宏船扩建、发展光明山普觉禅寺之外，还领导了新加坡佛教总会从事教育及医疗等重要的社会福利工作。宏船晚年获荣誉极多，更于1987年12月获泰国国王蒲眉王赐号“华僧大尊长”并授爵扇。这是泰王首次将最高法号御赐予外国高僧。1990年12月25日（农历十一月初九），宏船法师舍报西归，享寿83岁。1991年1月6日，普觉寺举行的奉安大典有近20万信众前来悼念。法师荼毗后，出现五色舍利不下千粒。2006年，普觉寺成立了宏船老和尚文物展示厅，命名为“思源轩”，以缅怀法师的功绩。

谢明达

#### 参考资料

- 《宏船法师纪念特刊》，新加坡：光明山普觉禅寺，1993。
- 宏船长老：《宏船长老法汇》，新加坡：光明山普觉禅寺，1994。
- 释传发：《新加坡佛教发展史》，新加坡：新加坡佛教居士林，1997。
- 释能度主编，释贤通、何秀娟、许原泰编撰：《新加坡汉传佛教发展概述》，新加坡：药师行愿会，2010。
- 于凌波：〈建设光明山普觉寺的宏船长老〉，收入《中国佛教海外弘法人物志》，台北：慧炬出版社，1997。



## 洪天赐

Ang Tian Se

*Hong Tianci*

(1936- )

学者

### 高校中文系的领航人

洪天赐是马来西亚高校中文系的奠基者与领航人，曾担任马来亚大学及拉曼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多年。他专长中国科技史，博士论文为唐代禅师一行的生平与其科学著作研究，被校外考委中国科技史权威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评为“所达到之水平乃在剑桥博士论文之上”。1987年为维护中文在大学的自由使用权，反对马大不允许外系学生选读以中文为媒介语学科之举而愤然呈辞。赛胡申·阿拉达斯 (Syed Husin Alatas) 出任校长时，重新召他担任系主任，至1991年退休。他旋即前往澳洲，先后出任珀斯柯温大学文学院中文部主任与天鹅学院创院院长，积极在海外推动高校的中文教育。拉曼大学成立时，他回国担任中文系系主任，并积极争取开办研究生课程。在他三年的领导下，该大学中文系迅猛发展，崛起成为国内最大的中文系。



洪天赐于1936年出生于瓜拉雪兰莪，祖籍福建南安。1959年获教育部奖学金，前往英国伯林斯福师范学院 (Brinsford College) 受训，毕业后回国执教于巴生英华中学。1964年进入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就读本科，1967年毕业后被派往太平华联中学执教。1968年回马大中文系当助教，同时修读硕士。1969年他考获文学硕士，升任助理讲师，1972年升任马大中文系讲师。1980年他考获博士学位。同年，被擢升为教授。他从本科、硕士到博士都在马大中文系就读，是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栽培的第一位博士与首位中文系教授。

1975年洪天赐首度出任马大中文系主任。他是继何丙郁教授之后，第二位担任此职的本土学者。之前由外援老师兼创系人郑德坤教授担任。何丙郁教授是第一位本土系主任，他在这职位上共担任了九年（1964-1973）。何丙郁与洪天赐乃师徒关系，后来由于何丙郁移民澳洲，洪天赐便接过系主任的棒子。他接棒之后，兢兢业业，无时不为系的未来发展操心劳累，努力争取聘请与栽培更多本地师资，致力于中文系的本地化，修订课程使之更趋完善，并在外教逐渐撤离后稳住系务。洪天赐的系主任职务分成三个时段：第一时段从1975年到1979年；第二时段从1983年到1987年；第三时段从1988年到1991年，先后总共担任了13年，也是至目前为止，在位时间最长的马大中文系系主任。他在任期间，曾进行课程改革，把原先A、B、C三组的课程，合并成甲、乙两组的课程制，即古典组与现代组，藉以更有效地提升教学。在师资方面，随着外援老师的相继回国，中文系换了本地的新血，并且增加到最鼎盛时期的16位老师。可见，师资阵容非常强大，包括国际知名学者如郑良树、陈志明、林水椽等，都曾经同时在马大中文系执教过。

洪天赐著有 *Fleeting Footsteps: Tracing the Conception of Arithmetic and Algebra in Ancient China* (与蓝丽蓉合著，2004)，参与了 Helaine Selin 编的 *Encyclopaedia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in Non-Western Cultures* (1997) 大型百科全书的撰写计划，并在国际会议、国际期刊学报发表了五十多篇有关中国科技、天文学、数学等领域的论文。此外，他也曾为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1972-1973），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1982-1983），剑桥大学克莱学院访问研究员（1983-1984）等，学术成就获国际学术界的重